

清末、民国、伪满时期扶余历史概述

高俊峰

扶余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城镇，远在辽金时期就已开垦设治。到了明朝末叶建州卫（满族）之后，扶余已成为八旗子弟兵驻防的重镇。现在扶余镇内东西南北四个营子便由那个时候沿袭而来。当时县城名字叫伯都讷，到了满清后期，改为新城府；辛亥革命后，改称为扶余县。扶余地处松花江中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沿江一带缺林少树，每届春季总是“风伯”肆虐，尘沙迷漫。因而东北有三句俗语：“狗咬沈阳，火烧船厂，风刮新城”。但扶余仍不愧是一个鱼米之乡！除盛产江鱼、粮食外，还有给皇家进贡的产物，如菰粒、鲤鱼。派有专人管理，名曰当“皇差”。扶余东街路南设有“果子楼”，蜜制御用菰粒；下坎鲤鱼圈，便是捕养鲤鱼的处所。同时扶余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县份，有满族、回族、汉族、蒙族、锡伯族等。扶余的江南江西都是郭尔罗斯前旗蒙族聚居的地方，与扶余是一江之隔，“一衣带水”，因而蒙汉族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总是川流不息地江南江北互相交往。总的来说，扶余虽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城镇，由民国至光复在这三十多年中，几经“沧桑”变化很大，各民族还是和平相处，没有发生大的矛盾。我所录忆的扶余变化情况，很难得窥全豹，只是根据我长期经商，对附近县公署和团部所耳濡目染的一些事，不可能面面俱到，难免有舛错之处，

希望有更多知情者，给以指正。

一、扶余政治情况

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帝是下台了，但是地方上行政长官，大多数是“换汤不换药”，许多清朝的“孤臣孽子”，辛亥革命后，摇身一变，便成为新国家的达官显宦了。扶余情况也不例外，只是在民国建立后，原来知府名称改为县知事（县长）也叫监督罢了。例如廖监督、刘监督（外号刘二生整），都由旧官僚蜕变而来。这些昏庸糊涂官，并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所想的只是“民脂民膏”。在民国五年，来了一个孔宪熙，二十七岁署理扶余县知事。那个社会只要朝里有人，就好做官，不是“任人唯贤”或“任人唯才”。孔宪熙的老师是浙江省长齐耀珊，因此来头很大。但是这个年轻的县知事，在工作上还是有些作为的：非常关心教育、卫生、地方治安。当时县知事权力是很大的，行政、司法、财经、教育，都是一身独揽。在量刑上，有生杀之权。孔宪熙每周六亲临各校，观摩听课，并经常下乡查学，对写白字的校长，和不认字的塾师，分别给以撤职和取缔学馆的处分。记得是，扶余私立第二小学校长孙洪业（外号孙大愣）在上呈文时，误把“效尤”二字，写成“傲由”二字，因此受到撤职处分；在下乡查学时社里站私塾陈先生，把下论语上“虎兕出于柙”的“兕”字，错念儿子的“儿”字，因此学馆被解散。在整顿地方治安上把通匪的窝主张寡妇处以绞刑。张寡妇居住扶余东园子，是一个不守妇道的混帐女人，她不但通匪，并窝藏枪支。孔宪熙派兵在张寡妇家中，逮捕大匪首“东边”，另一个匪首“扫北”，在逮捕中被跑掉了，妇女被处绞刑，这在民国成立后，扶余还是第一次。

孔宪熙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跟地方上，在野势力的矛盾很大，主要跟大豪绅付广的矛盾。他们俩“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结果孔宪熙被付广告倒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无官不贪，如果孔宪熙没有贪污行为，也不致被付广告倒。

付广究竟是一个何许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在扶余副都统衙门当过总理（秘书），民国成立后，虽然免职赋闲，仍有很多人对他拥护，因而形成在野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跟官府的对抗，主要扩大自己派系的势力，很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在我记忆中，付广就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时间是在民国十九年，秋季，由省指令在扶余成立一个水道局，并在沿江设卡，凡是江南、江西到扶余卖柴草的车辆，都得作价课税，另外肩挑小贩携带猪猡、马尾，以及皮张等，完全作价课税。因而江边上，出现了路净人稀的情况。老百姓最惶恐的是柴草不往扶余来，燃料上发生困难。付广了解这些情况，率领自己的亲信，号召一部分群众，便把水道局牌子摘掉了，并把屋内家俱捣毁了，付广便代表扶余民意到吉林上告。省府避免事态扩大，遂把水道局撤消。

另一个地方豪绅是集厂的刘明阁，过去在县公署当过“经承”，免职回乡后，便成为地方上大豪绅，胁官告吏，武断乡曲。县知事赵荣山，保卫总队长赵德山，都被他告倒了。在孔宪熙被付广告走以后，继任县知事是张凤墀，是一个老奸巨滑的老官僚，举人出身。到任后，百般向付广讨好，并给付广挂了一块匾：“一郡太斗”。

张凤墀解任后，继任的是杜瑞林，这个文职官员，喜欢武装打扮，出门总是穿军装，骑大马，前护后拥，不是赛马就是打靶，总之一句话，不务正业。在民国九年调走后，继

任的是洪汝冲，时间不长被撤掉了。接替继任的是李科元，山东济南府人，以后由扶余转升哈尔滨滨江县长。继任县知事的是李毅，是年二十六岁，是吉林督军孙烈臣的干儿子，他和孙宪熙相比，大相径庭，是一个纨绔子弟，每天只是吃喝玩乐，一切工作，全由总务科长代拆代行。在李毅任上，民国十二年越一次狱，跑了十几名犯人，因此受到调职处分。接替李毅的是孙洪卓，在任一年多，就被免职了。继任的是赵荣山，到任以后，想方设法尽量搜刮，并将库中抄查物品，都用以次顶好的办法倒换出来。同时巧立名目，给在押犯人成立一个习艺所。利用这个机会，大肆贪污。在开庭审讯时，自报赵青天。在扶余这些脏官中，就是他搜刮的“天高三尺”。在他离职时，扶余绅商各界给他送一块匾，写的是“可见青天”，实质是：你走了，我们可见青天了！赵荣山走后，继任的是孙殿魁，他是张作相相当二十七师长时的军法处长。孙殿魁在扶余当了七年县知事，时间是最长的，虽然没有什么善政可述，但也没有什么劣迹可言。在旧中国比较清廉的一些官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孙殿魁在扶余东屯菽粒厂，购置了二百多垧土地，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便被免职了。

一九三二年伪满政权成立后，第一任汉奸县长是陈之瑛，到任不足三个月，李海青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便进驻扶余。李海青对陈之瑛的生命和财产，都给以足够的保护，在这场事变中，陈之瑛没有遭迂任何困难。李海青撤退后，他也被免职。接替陈之瑛的是丁光普，这个人是洋奴出身，“九·一八”事变前，在日本领事馆当过翻译，在一九三四年，被孔凤严（满洲报主编）揭发贪污情况，而被免职。接替丁光普的是郑颐津，在辛亥革命前，在扶余做过知府（一般满

族人称呼为顾大人)。接任不到一年就有病了，前往哈尔滨治疗，便病死在哈尔滨。接郑顾津的是冯荫树，这时县公署已派进日本参事官，名字叫铃木三藏，井务局已派进日本指导官，叫小野田，卫生股的叫桑山，烟务股的叫引地，司法股的叫熊田，保安股有桥本、宫下，以及特务股的三上，这时一切权利，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全县最高决策机关是审议室，清一色的日本人。在伪康德元年，扶余便成立了协和会，名义上是“宣德达情”，实质是日本的帮凶，鼓吹什么“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等。举凡一切政治活动，都有“协和会”参加，例如兵役、劳工、勤劳奉仕，青年训练、防空演习等。县设“协和会”县本部，事务长是梁济霖。各村镇设有协和分会。在“协和会”领导下有国防妇女会，实质上，除了伪政府外，又给人民增添一套统制机构。中国人县长的工作，就是清晨上班，率领闾署官吏，举行什么帝宫遥拜；另外就是在参事官签字的文件上画行盖章，实质就是一个傀儡。各科股的情况都是如此。伪县长冯荫树有时背着日本人，也发一些牢骚，说什么“县长苦，县长苦，一个月就拿二百五（工资）。大事有参事官，小事我也不敢主”，充分暴露了这些指日高升认贼做父的伪官吏，在灵魂深处是多么烦恼。冯荫树免职后继任的是张承露。日本人参事官改为副县长，名字叫森守信。张承露调职后，继任的是宋德谦，以后调转义县，光复后被镇压了。继任宋德谦的是杨桂滋，一直到光复，以后被镇压了。

日本人虽然是大权独揽，在下边也培养了一些警犬，就是警察和特务。日本侵略者在全面进攻中国的前夕（一九三六年），便在东北实行了经济统制，初步统制的有粮谷，棉布、纸烟、油类、白糖。并在警务科成立了经济保安股。警

察署成立了经济保安系，由于实行经济统制，警察权限扩大了，也就有勒索机会，警察可以随意到居民家，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即便检查不出统制品，可以“吹毛求疵”打你几下，什么卫生不好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经济统制后，大多数警察到商店拿商品就不付款了，商店也不敢收款。把一个经济繁荣的扶余县弄得关门闭户。

另外，特务闹的更凶，一九四〇年，伪警察厅组织了一个特殊搜查班，由榆树等地抽调的警察，内有林警尉、唐警尉、刘子峰、徐大马棒等，代头人是日本人黑田。他们到扶余后，住在扶余南街“增盛谦”，这帮凶神恶煞，以搜缴枪支为名，实行敲诈勒索。凡是城乡比较富裕的住户，都是勒索的对象，随便抓人，施以严刑（如灌辣椒水、探马眼等）。在严寒三九天，将被抓的人裸体赶到井沿，往身上浇凉水，呼叫之声惨不忍闻。他们除勒索受贿外，还霸占女人，唐警尉在长春岭把一个吴姓闺女硬给霸占了。省里搜查班撤走后，扶余警务科又组织两个搜查班，一帮是以免职的警尉补冯国玺为首；另一部是以大流氓赵济洲为首。这一群害民贼，在各屯闹的是鸡犬不宁。当时有两句谚语：“家有千顷地，不如当个小警士”；“家里有个警尉补，全家大小都有福”。他们一直闹到光复为止，冯国玺被镇压了；赵济洲潜逃了。他们都是恶贯满盈应得此下场。警察也不例外，光复后，走死逃亡，没跑掉的，便被人民镇压。被镇压的，计有刘永官、孙瑞堂、邵登瀛、武克强等。老百姓除了痛恨警察外，其次痛恨的是区事务员。他们利用抓劳工的机会进行勒索，作威作福。伪满建立伪政权后，扶余最初施行的是“保甲制”，第一任保长是苗向荣，第二任是万寿臣。以后保甲制改为“街村制”。第一任街长是付定云，第二任是由善

祥。保甲制和街村制都是基层统治人民的机构。县公署有事下达街公所，由街公所下达各区公所。主要工作是清查户口、劳工、兵役、和一些苛捐杂税（如门户费等）。这些保长、街长等，都属于扶余上层人物，他们与官府勾结，为虎作伥，成为压迫人民的帮凶。

但在光复前，三十多年中，上层人物里也有几个比较好的，如瑚图礼（满族），外号瑚站官，给穷人舍米就舍了三十多年。沽名也好、钓誉也好，一些穷苦人总算吃着米了。给米的方式：每日清晨排队，每人一平碗，放米人名字叫付老琿。施米三十多年，虽然是“杯水车薪”，在旧中国来说，也算是凤毛麟角了。在黎元洪当大总统时，颁赐的匾额是“急公好义”。另外一个人就是李鹤山（外号李大秀才），这个人可以说，“品粹学优”，从不与人勾心斗角，并在慈善会也提倡了一些公益事业，如养济所等。黎总统颁赐匾额是“热心公益”。过去办公益的事，他们的愿望原本是好的，可是收到的效果还是很糟的！主要是办事人，营私舞弊，一些鳏寡孤独的人，只能每日两餐灌粥，维持生命，一些老年人褴褛不堪，鹑衣百结。

在民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行政司法，都是县知事一手独揽，因此权很大，出口就是法律。由于旧社会没有法制，因而出现了诚大屠户、金大杀等，草菅很多人命。从民国十五年，建立了司法公署，第一任司法监督是侯监督，第二任是关监督，第三任是陈之瑛，第四任是刘长庚。刘长庚从前是审判官。陈之瑛解任后，他被提的。司法公署成员除司法监督一人外，下设审判官、书记官，其余工作人员名为承法吏。着装是黑色帽子，白帽箍，开庭时法官的衣服也是黑色的，主要表示“铁面无私”。在旧中国和伪满统治下，大

多数劳动人民处在贪官污吏、警察特务勒索压迫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二、军队和治安情况

在民国成立后，扶余维持地方治安的军队，就是捕盗营。这个军队是由清末新城府知府金道监成立的。军队的首长，叫管带。第一任管带是曹振刚（外号曹二虎），以后转升哈尔滨骑兵团长，他就是哈尔滨逆伦案小说中的主角，他和全家人，被他大儿子曹佩雄枪杀了；第二任管带李洪奎（外号李大眼珠子），以后转到吉林，由于通匪和霸占女人，被枪毙在吉林九龙口；第三任管带是崔德财；第四任是崔振清（外号崔慌子）。在民国十三年，改为游击马队，队长是鲁志曾；最后一任是韩柏峰。伪满政权建立后，便被裁撤了。另外县公署直接统制的军队，有保卫团，在民国八年改为保卫队。最初保卫团只有一百多人，团总叫雷继凤（外号雷聋子）。改编后的保卫队，共分为九个小队，外八区，分驻八个小队，县城本部驻有一队，总计七百多人。第一任总队长尹捷三；继任的是张连凤，在城东十二里地四木克勒，剿匪阵亡；接替张连凤的是赵德山，被集厂大豪绅刘明阁告倒了；接任赵德山的是由吉林派来的一个刘队长，到任不久，李海青进驻扶余，刘队长便逃之夭夭了；最后一任总队长，是赵有金。在伪康德三年保卫队改为警察大队，规模缩小了，只扶余县城一个队，外八区分队，完成撤消。扶余进驻陆军是在民国七年，初到一个营，营长是郝子寿。民国八年团部也进驻了，团长姓梁，天津人；以后接替梁团长的是杨遇春（回族），杨遇春升任盘石县旅长；继任的是赵六爷。这时扶余治安非常紧张，经过直奉两次战争，加捐增

税，钱毛货涨，并抓车拉夫（上前方），闹的民不聊生。乡村土匪蜂起，破窑绑票，时有所闻。由于由家窝堡，被土匪久胜攻破，因而农村富户纷纷迁往城内。但是城内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县公署在前后大门修建了炮台，各商号为了自保，也都纷纷修建了炮台。如“增盛谦”修建了三个炮台，“永兴长”、“福和当”、“裕来公”、“吉太庆”“增盛庆”等全都修建了炮台。真是碉堡林立，如临大敌。扶余虽然有许多军队，由于军政腐败，兵匪私通，剿匪流于形式。赵团长撤职，继任团长的是陈铭安。在陈铭安任上，逮捕三营刘营长（匪号大生字），他在投诚后，虽然“桂冠花带”，当上了营长，仍然恶习不改，本性难移，勾结大股土匪，坐地分脏。最令人发指的是，纵容士兵奸污妇女，他的队伍进驻某屯时，便令士兵自找岳父（意即自找女人），他在长春岭一带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刘被长春岭张彩宾等联名，在吉林督军署上告了，因而电令陈铭安逮捕刘营长。陈以召集开会的名义，把刘营长调进县城。在给刘营长的迎风筵上，将其逮捕，同时还逮捕了他的五个爪牙，有他的干儿子小阎王。刘的哥哥，在他被捕后，进县探听消息，也被拘留。并由吉林派来两名参谋长，进行审讯。由于证据确凿，无可抵赖，在押不到两周，连他哥哥一共七个人，都被枪毙了。由于镇压了刘营长，长春岭得到了暂短的安定。陈铭安还破获了拐骗绑架犯岳海荣一案，他是“同发合”代理店经理李焕章的外甥，他把李焕章一个六岁儿子从家中骗出，转送土匪，并以看望小孩为名，从中通风报信，并由李家骗去吉帖三十万吊，说是“赎票”，结果他怕小孩暴露真相，把小孩用铁锹砍死，后被陈铭安查明，而把岳海荣枪毙。由于这件事破案迅速，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李焕章给挂了一块匾“保障群黎”。在陈团长任上，第一营营长张庆祥和三营刘营长真是鲜明对比——张庆祥是行伍出身，军纪严明，下乡剿匪，从不扰民，因此受到城乡人民爱戴。张庆祥曾给关帝庙挂了一块匾“军人模范”。当时有人说：张营长本身就不愧是一个“军人模范”。但他在民国十三年冬季，在东莺山（本县新站西南）剿匪，而英勇牺牲。人民为了怀念他，编了一首歌词（苏武调）：

“十月天气冷清清，阵阵起寒风，大地已结冰，东莺山、胡匪凶、乡村不安宁。一营张营长，领兵前去征，谁知又成鬼，落在贼手中，阵阵悲风，落为一个万古忠孝名”

在张营长出殡时，扶余城内是万人空巷，每人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夹道送行。现在他的儿子仍在扶余，名字叫张天相。

在陈铭安调升后，杨遇春旅长，由盘石换防到扶余，他手下骑兵团长是张廷弼，是吉林督军张作相的侄子。杨遇春不久就到吉林当顾问去了。张廷弼在扶余驻防达七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他是张家的嫡系，因而日本人把他撤掉了。接替他的是伪满第一个在扶余的汉奸团长陈树宽，在一九三二年农历正月初一接的事，二月初九李海青进驻扶余，陈树宽便带队逃往前郭旗。在“九一八”事变后，扶余境内胡匪急剧增加，有的以抗日为名，混水摸鱼。例如赵有金报字“平东洋”，以抗日为名，而遂其抢掠之实。有的人股土匪，被大汉奸于琛澄（外号于大头），招降收编，如桑老九、东平、都降为团长；双侠、风好、忠南侠等都降为营长。其各股胡匪，在李海青到达扶余时，都被李海青收编，总共编了十五个团。李海青在扶余总计驻防三个月，军纪严明，公买公卖。来扶余攻打李海青的是张海鹏的汉奸队，

一共来了八个支队，四个支队进犯扶余，四个支队进犯长春岭，李海青在长春岭没做大的抵抗，便撤往江北三肇一带。在撤退时，有一部分随海青转战关内，另一部分有的溃散，有的投降日寇，如云龙、海楼、仁义等都降在扶余尹保衡部下。

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份有一部东北军是冯占海的部队，领兵司令是张纯玺，原计划在青山口过江。这时扶余一团团长是尹保衡，他密令蒙古兵在江南堵击，因而演成回军攻击扶余的一场大战。由于商会派人调停，并送了一些防寒用品（毡袜帽等），张司令也不愿作无益的牺牲，便撤往江北转战三肇。可是在十二月份由三岔河来一股日本军，首先进犯长春岭，声称讨伐东北军，在长春岭捕空后，便进犯扶余。但是行进中，在高家粉房演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原因是日本军进入高家大院，看到屋内人多，因而生疑，便进行搜查，翻出一面青天白日旗，便将所有男人完全赶到大坑里用机枪点射进行屠杀。以后窜到扶余驻防一个时期。这时尹保衡由于抗走了东北军，在日本主子面前演了一出丑表功戏，扶余商会一些溜须拍马的头头们倡议给尹保衡立了一块遗臭万年的战功纪念碑（光复后被群众推倒）。一九三三年尹保衡便升任农安第一旅长，接替尹保衡的是郭咸宜。这时伪满政府已实行征兵制，废除了募兵制，郭团长走了，便换了杨子新，这时团部也派进了日本人，少校付官阿部，军需官鸭在田，一切大权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这时扶余又遭遇到第二次大屠杀。据说：由肇源追捕土匪过到江南一部日军，追捕到下坎犴子洞，这帮日寇武断地认为是匪窝，不分老幼进行屠杀，连吃奶孩子也杀了。杨子新走后，换了一个王团长，时间不长，便被调走讨伐去了。最后一任团长是田春

凤。田春风队调走后，扶余便没正规陆军。保卫县城是由警务科成立的警备队，队长是楚柏林。这支部队全由地痞流氓、土匪组成，例如田三虎、郭延和全是土匪出身，郭延和匪号“大清乐”。这帮人在“八一五”光复的当天，就开始叛变，并把南街路西“颍川”医院大夫颍川锦立和他一个侄子，两个侄女儿，都给枪杀了。颍川是台湾人，本名陈锦立，后改颍川锦立，在扶余开设医院，警备队看病吃药也得付款，因此怀恨在心，便借光复机会，由小队长闻孝君率领，便把陈锦立一家人，给枪杀了。只剩陈锦立老伴和一个六七岁小儿子。

在光复当天，老百姓都是额首称庆，祝贺祖国光复。另外也产生了隐忧和恐惧，随时都有被抢掠和枪杀的危险。这时由杜国华出面，由伪满中央银行提款，给警备队每人放饷伍千元，并宰了四口猪进行慰问，这才避免了一场叛乱和大屠杀。而当时伪警察署长杨文祥看到扶余当时险境，便把四个门的派出所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并召集了自卫团，全部发给武装，形成一股武装力量，在防止警备队叛乱上，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后来才知道杨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久由程世清率领的八路军进驻了扶余，很快便与老百姓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有啥活干啥活，使老百姓既爱戴又惊异，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真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亲！扶余人民真正解放了。

三、扶余经济情况

扶余地处松花江中游，航运非常发达，进口物资是以木材为主，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民国成立后，东北铁路主干线，就是丁字形的中东路，长春以南是日本势力范围，长春

以北，属于中俄合办。中东铁路，实质是俄人的势力范围。吉海路、四洮路、平齐线，都未建筑。在运输上，主要依靠江上航运（松花江、黑龙江）。在吉林下游，扶余是一个比较大的城镇，长白山的木材由吉林放排出口到扶余，然后转销各地，如开通、洮南、大赉、头台、茂兴、三肇等地。扶余便成为木材集散的中心。每到夏季江上木排源源不断。在民国五六年的时候，大小木帮（排木局子），总计有一百二十余家（单帮野排在内）。吉林“成”字号木场，在扶支号就有二十余家，如“公成信”、“义成和”等。“公成信”是扶余妇孺皆知的一个木场，每年正月秧歌办的特别出色。扶余木货每到封江后，洮南，三肇等地都到扶余购运木货，真是“车水马龙”，忙碌非常。由于扶余江上航运便利，外埠大商富贾都到扶余坐庄收粮，计有俄商“中东铁路公司”，并在西江沿设有粮台，每周一次票船（俄轮船）来扶运粮，并搭载旅客。另外有官银钱号，永亨通达，全都大批坐囤粮食。扶余本地计有帆船（俗名改鳅）、三百余艘，每到夏季真是樯帆如林，舳舻蔽江。沿江一带，成为闹市。因扶余粮价高于江南，江西、三肇、头台、茂兴等地。以上各地都到扶余卖粮，同时也在扶余购买了日用物品。因而商业形成了购销两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直奉两次战争，东北通货急剧膨胀，贬值最多是奉票。虽然奉天当局，枪毙了“天合钱”经理，依然挽救不了奉票厄运。江钱、吉帖，虽比奉票好一些，但也步步下跌。扶余商号采购商品，远在营口、大连，近在长春，营口以炉银为本位，大连、长春，俱金票为本位，到卯付款。吉帖贬值，大批商号都是奄奄一息，其中洋杂商店，亏累严重。他们经营的商品，全是金票付款，因此“同义德”、“大德新”、“同华

新”、“毓林堂”、“毓林祥”都相继倒闭了。但是畸形发展的就是粮业，他们购粮完全使用吉帖，但出口卖粮全是金票。由于金票逐步上升，因此商业中，就粮业占了很大便宜。扶余最大的商号“增盛谦”（烧锅），经营范围酿酒、制米、制面轧油，以及出口粮食。其余粮商如“双兴太”“大成店”以及后起的“丰隆和”、“裕丰当”，当时资本都很雄厚。但在粮业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增盛谦”，能以左右市场垄断包市。由于“增盛谦”是扶余大地主韩瀛洲独资经营的，资本雄厚，在制油、制米和酿酒上完全机械化，共雇佣四百多工人，并拥有四十多支手枪，二百多支大枪。由于机械化生产，产品费用大幅度下降，其它商号在产品竞销上，只有甘败下风了。因而街上经常出现打倒商阀栗荫轩的口号。“增盛谦”的资方代理人，大老板是沈辅臣，二老板是栗荫轩。主要是栗荫轩主持一切。该号虽然在一九三二年受到李海青的攻击有很大损失，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到一年时间“增盛谦”的元气，便完全恢复了。扶余的商业在伪满建国后，实行了币制改革，东北三省所有市面流通纸币，完全用伪满国币兑换，吉林官帖五百吊，兑换伪满币一元。初步有些人受了一些损失，但是钱法稳定，没有忽涨忽落的危险，因而商业出现了暂短小康局面。可是扶余商业总是三灾八难的，在“七七”事变前，日本为了大举向中国进攻，并准备第二步太平洋战争，因而实行了经济统制。主要物资如棉布、粮谷、纸烟、食糖、油类，接着连水果都统制了。由于粮谷统制，许多磨坊、油坊、以及酿酒业，因为没有原料都纷纷倒闭了。就连资本雄厚的“增盛谦”，以及“增盛福”火磨完全停业了。粮谷指定“福记”一家为配给店；棉布指定“吉盛太”为特殊配给店，酿酒指

定“德昌润”一家配给，其他商店，所分到的配给品，已是微不足道了。大部分商店的商品，全都转入地下，柜台上不见了。如有婚丧嫁娶，只得托人情、出高价才能买到一点需要用品，因此扶余商业呈现一片萧条景象。在伪满将要崩溃前夕，许多人买不到棉布，只好穿上粗如麻绳的“更生布”，真是鹑衣百结，褴褛不堪！

四、教育情况

民国成立后，虽然提倡实行新学制，但是政府并不重视教育，扶余城内成立了几处学校，只是装潢一下门面而已。教育拨款太少，教师待遇低劣，因而缺少师资。在乡村只有一些私塾教育授学童，而所读的书，仍然是“百、三、千”和“学、庸、论、孟”。扶余最初只有中学一所，由于经费问题，而转移了。后来只有县立高小和公立高小（满蒙校）。在民国十二三年的时候，中学又恢复了。扶余除县立几所学校外，有满蒙校、山左校，还有教会办的“三育校”和“华文校”。这些学校属于“财团法人”性质，不由国家补贴，完全由本团体募资办学。在旧中国虽然办了二十多年教育，可培养人才上收效甚微。一般情况是：穷人子弟念不起，富有子弟不往好处念。在旧社会上大专学校的很少，其中有几个比较好的如张英华、夏景芳等。另外如武洋、杨惠芳等，应名上大学，实质上不务正业。例如杨惠芳书没念好，可是京戏学的不错；有些人学非所用，利用大学资格而踏上了升官发财的途径。扶余有几个出人一头而当上大官的并不是从教育界选拔而来，例如巴凌云，是行伍出身，而当上了黑河镇守使；肖振瀛是一个投机商人，利用翻云复雨的手段，而当上了省议员，以后当了一段西安市长和天津市长。

这些人都是不学无术，他们当官为了升官发财，并未给人民办过滴滴点点的好事。

从扶余师资来说，如县立高等小学于校长，满蒙校纪校长，数学老师崔明扬，物理老师关思齐，可以说是品学兼优的老师，但是凤毛麟角鞭长莫及，很难使广大学员遍受其诲。伪满时只把学生当作迎送工具，今天接张三、明天送李四，又迎“诏书”，又接什么“天照大神”，真是忙的不可开交。对学生完全进行奴化教育，什么“八紘一宇”“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等等，丝毫没有教育意义，完全为了训练驯服奴才，使学童在心灵深处沾染了很多毒素。在伪满，扶余最高学府有男子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和一所优级校。这时也被日人掌握，男高副校长是日本人松永，优级校日本老师丁田。总来说起：扶余政治、司法、军事、教育，完全由日本人控制。

五、扶余娼妓的遭遇

扶余地处吉林下游，吉林的木材源源不断流放到扶余，因而便成为木材集散的中心。另外由于航运的发达，南门外沿江一带成为繁荣兴盛的闹市，但也是藏污纳垢的场所。在民国七、八年的时候，南门外的娼妓急剧增加，总计有一百二十家。比较高级的如“宝玉班”、“桂兰班”等；另外还有什么“欢乐堂”、“四喜堂”、“文雅堂”等等。凡是做这项伤天害理营生的都是些流氓、兵痞，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他们都是利用关内水旱荒年，诓骗少妇幼女，以买义女、说亲事等手段，把人诓到扶余，逼良为娼。青年妇女来到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的地方，在这帮吸血鬼淫威逼迫下，只得含泪卖笑，以卖身求生。另外也有一些自甘堕落（大部

份吸毒），而饮鸩止渴。这些人，靠近一个柜头、劈帐，名曰“搭住”。有的青年妇女在长期卖笑中，也有遇到一些投心的热客，便也“海誓山盟”，由于男方无力赎身，因而双双服毒自尽的，时有所闻。在那肮脏世界里，性病充斥，花柳泛滥，很多“章台走马”的少年，和久溺烟花的妓女，大部份都染上了花柳病。什么鱼口、便毒、杨梅升天、杨梅落后，以及破伤风等恶疾。在那个缺医少药的社会里，很多人都伤残毙命。旧社会娼妓的遭遇，就是人间地狱。

做这项生意的龟头（俗名叫领人的），他们这些人，据我能回忆的，有曹凤鸣，在长春给日本人当过巡捕（兵痞），在民国十九年春节前夕，三十早晨枪走火而结束了狗命；卢万山是“四喜堂”的龟头，在扶余坑害了许多妇女，攒了一些造孽钱。在回天津途中，被土匪抢劫一空。另外如郑洪升、贾振玉、马世昌、毕玉田、梁天吉、肖振林等都是“坑一千害一万”最后自己落个穷光蛋的，没有好结果。

在民国十五年，县公署成立一个“济良所”，凡是妓女不愿操此贱业者，跑到济良所可以受到保护，允许自由择配，并规定本家龟头不许追索。成立“济良所”的愿望是好的，而收到的效果却是很差的。妓女到了“济良所”，并不能自由择配，而多数由所里垄断给以指婚，大部份都是所里没有妻室的人。另外由于龟头们监视严密，是很难走出的，因此说效果不大。到了伪满时干脆取消了“济良所”，娼妓业仍如已往。

六、扶余吸毒泛滥情况

从民国成立后，一直宣传禁烟（鸦片），在旧中国和伪满时期，上至贪官污吏，地主豪绅，下至贩夫走卒，娼妓流